

反和平的陰謀

作兎巴·夫尔拉·英
譯 符 眉



七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版出社識知界世

七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謀陰的平和反

著克巴·夫爾拉·英
譯符賓

版出社識知界世

月三年〇五九一

前言

勝利日，莫斯科的天空晴朗無雲。一羣羣的人們，都走到城的中心去，擠滿了紅場，在閃耀的陽光和克里姆林羣塔的長長影子下移動。他們擁到麥尼格廣場，到亞歷山特洛夫斯基花園，在那裏，落日的光輝在嫩綠的叢葉中閃爍。他們一直散佈到高爾基街，擁到蘇維埃首都所有的廣場和街道。

五一節那天，我站在紅場上，當勝利的禮砲響過之後，我覺得彷彿是在浩漭的幽深的海之邊，一陣大風暴之後，海水已經平靜安息了。成百萬的人們曾經等待着這一時刻。雷巴契（Рыбачи）崎嶇不平的海岸的沉默的哨兵，作戰以後在桔梗花、苜蓿花、和野石竹花——在俄羅斯草原的所有這些平常的花叢中休息着的戰士們，被勞苦的工作和寂寞折磨得憔悴的婦女們，結着彎彎辮子的、曾經渴望脫下粗陋制服換上春日輕裝的少女們，渴念着故鄉田園風味的農民們——所有這些成百萬的人們。曾經夢想着的和平勞動，終於在這勝利的時刻，在這個國度裏來臨了。

「我們勝利了」——這句話響遍了遼闊的蘇聯國土的全境。這句話不是得勝時候空洞的誇耀，而是由那些親歷戰鬥、相信他們是為正義而戰的人們所喊出來的。多少慘痛的日子，多少被

攻陷的高岡，多少冒着危險清除了地雷的深谷和道路，多少在彈雨下遭受追逐的護航隊，多少里從戰爭一開始到最後一小時跋涉過的蘇聯、波蘭、巴爾幹和德國的土地！勝利是以巨大犧牲的代價贏得的，是以蘇維埃人民的血和苦難的代價贏得的。就在這勝利日的紅場上，我想着人類對於蘇聯的無限的感激，因為她曾經把世界從希特勒主義下救出來。

現在，勝利與和平已經到手，人民又開始想着未來了。

我加入了團集在莫斯科大學前面洛摩諾索夫（Lomonosov）紀念碑的學生羣。他們所有參加這一天慶祝的人，也許最敏銳地感覺到，勝利已使他們恢復了和平勞動和創造研究的光輝的遠景。

他們緊緊地圍擠着他們的教師，愉快地然而認真地問着關於將來的事情。

當他們一想到將來，這些青年們的心情，就充滿了激動的歡喜，因為這個將來，在昨天還為那戰爭的巨大惡魔所遮蔽着呢。

在莫克霍伐亞大街上，我從莫斯科人羣中擠過去，到了美國大使館的大廈。在一扇緊閉的窗戶前面，站着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公使凱南的高大的身子。他默默地注視着人羣，站在從下面望不見的地位上。現在，嘈雜的鬧聲低下去了，只有他不斷的喃喃自語。

我注意到凱南注視着這激動的場面時，他的臉孔帶着一種可怪的焦躁和激怒的神色。於是從窗口轉過身，向人羣瞥了最後一眼，冷然的說：

「他們正高興着呢。……他們想着戰爭已經過去了，但這種不過是開始啊。」

當我離開大使館之前，我看到羅斯福的肖像——他的英明的頭腦，和煥發的笑容曾經君臨着這間房子——已經換上杜魯門的肖像掛在牆上了。

這一天，我不大注意到凱南的話，但在四年後的今天，它却銘刻在我的記憶裏，猶如我在勝利日所見所聞的一切同樣的深：那從郊區湧入莫斯科的人民，那些曾經莊嚴地相約「戰後再會」的人們的重聚，那蘇維埃人民願望與他們戰時盟國和平合作的真誠的友善的流露。

從那個神聖的日子以後發生的事情告訴我，這個美國外交家在勝利日的喃喃自語，原來就是對於這種友好合作政策的拒絕。外交家總是口不對心的。但這一會凱南倒是說出了他的由衷之言。

當我回到英國幾個月之後，我發現抱着他那種見解的，不止是他一個人。英國人民由於對蘇聯人民真誠友善的驅使，曾經投票選舉了一個以與蘇聯合作為競選綱領的政黨，而直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還看不出貝文的政策，原來只是舊日的可恥的邱吉爾反蘇政策的延續，這種政策要在蘇聯四圍邊境建立一連串的敵國圈來「包圍共產主義」。這個政策就是邱吉爾企圖阻撓第二戰線，把它轉向巴爾幹，寧可延長戰爭而不願看到蘇聯勢力擴展的動機。這種存心，不是表現在蘇聯對日作戰的二天以前，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決定嗎？這一決定，不是正如勃蘭凱特教授（Prof. P.M.S. Blackett「原子能的軍事與政治後果」的作者）所說，「並不能說是第二次大

戰最後的一幕，倒是現在進行中的外交冷戰的第一幕」嗎？

在一九四五年，英國人民還相信着新選出的工黨政府會停止這一可恥的政策。但在倫敦的官方，却看不出這種的幻想。不管什麼政府當權，英國外交部和那些忠實反映它的見解的報紙，最關心的事情就是破壞蘇聯在英國工人階級中廣大的威望。他們用盡一切手段污蔑蘇聯和它的軍隊，儘管這種手段是並不可靠的。最微細的事情都被英國廣播公司大事渲染着。各種各樣的「俄國通」，第二次大戰以前誹謗蘇聯的專家，都被他們外交的主子們，從冷藏庫搬了出來。

然而那時候，工黨議員們仍舊認為利用英國人民對蘇聯的同情，空談他們的競選諾言是有利的。當工黨黨員僅僅爲了依照工黨競選前的保證說話和行動而被開除的時候，當一個工黨黨員不去支持邱吉爾所發起的、爲使於美國統治歐洲的「聯合歐洲」運動，而參加保衛和平大會，因而有十分危險的時候——這樣的時候當時還沒有來到。這樣的時候，要到邱吉爾在福爾頓（美國密蘇里州）抄襲戈培爾醜惡的「鐵幕」詞句，在杜魯門總統面前，呼籲建立英美反蘇集團，而英國官方默不作聲的時候纔開始。

英國服役於美國的利益，再沒有比在對德問題上表現得這樣明顯，美國和英國統治階級把復興德國的戰爭潛力以準備未來的反蘇戰爭，作爲他們在歐洲的主要目標，現在是毫無疑義了。

英國政府不能依照國家的利益，採取一種獨立的外交政策，結果給英國人民帶來的禍害，並不比對世界和平的危害來得小。英國的「馬歇爾化」已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顯要的美國人已

不再掩飾他們的企圖；就是把英國經濟生活導向利於美國在英國本土和帝國以內的投資。換句話說，「社會化」必須是符合於美國資本家的利益。

當一九四九年四月，貝文到華盛頓去簽訂北大西洋公約的時候，英國在那「剛在開始的戰爭」中對美態度的立場，是大家都知道的。這樣的做法，正如美國進步作家史密斯（J. B. Smith）所說，英美政府是在他們尚未和第二次大戰中的主要敵人締結和約之前，就簽訂了一個針對他們在大戰中的最偉大的盟國作戰的條約。

這個公約包含着什麼意義呢？在杜魯門總統參加簽字典禮的幾分鐘以前，美國樂隊在大廳中演奏了一隻吉爾西溫（Ginsberg）的歌：「這不是沒有用意，」這個公約的意義，不是全都包括在這個歌名裏面了嗎？

愛好和平的人民，不能對這個公約漠然置之的。

北大西洋公約不是為和平聯合了世界，而是為戰爭分裂了世界。這個公約的真正性質，是要血心構成對和平的威脅；英美以及其他簽字國的政府參加了這樣的公約，實已給予了聯合國以一個打擊，這不是他們空談和平所能掩飾的。

北大西洋公約主要針對着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但同時也針對着那些簽字各國國內的民主自由，針對着我自己國內的人民。

這個公約，這個反對蘇聯的軍事同盟，是和英蘇合作互助條約直接衝突的；根據英蘇條約，

英國曾保證不締結「針對締約國的任何聯盟，和不參加針對締約國的任何聯合。」無論什麼詭辯的話，都不能掩飾在法國封丹白魯（Fontainbleau）的軍事參謀委員會正在計劃對蘇作戰的事實。

近年來這些重要的事情，使我想起了美國外交家凱南在蘇聯人民慶祝勝利那天所說的話：「戰爭纔不過在開始呢。——」那「冷戰」——甚至鬥爭的術語也帶着油滑的美國化——已在需要着犧牲者。我指的不是福萊斯特這種人，他爲了恐嚇世界，而結果只是使自己陷入了極端恐怖的瘋狂中。正是西方的工人階級，不得不担負了他們政府軍事計劃的代價，首先是我自己國家的英國，拖延很久的生活救濟，即使不是無限期的拖延下去，也要長期拖延的了。如果英倫三島真的像美國原子戰略家所正在策劃的應當成爲未來戰爭中的馬爾他島，那麼，英國的工人階級，稠密的工業區的居民，就將承擔最深重的苦難的重負了。

大西洋公約和英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意圖的其它表現，都導源於一種故意捏造的神話——蘇聯侵略危險的神話。作爲一個在蘇聯住了八年光景的新聞記者，我認爲用我自己的觀察來反駁戰爭販子罪惡的鬼話，乃是我對自己國家的責任。

英國人民應該知道那些出賣他們利益與和平事業的人們的真相。

我從長期的艱苦的經驗中纔瞭解了這個真相。我是在中等階級的環境中生長，對於嚴肅的生活的現實毫無所知，因此不得不通過經驗的教訓，纔懂得了這個真理。

我充當英國各報駐歐洲的記者，有十五年之久。在這個時期中，我經常眼見着英國外交政策的發展，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它越來越反動。我認為這個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是違反了我國大多數同胞的利益的，而它竟已引着他們從慕尼黑式的投降走到了大西洋公約。

我要敘述我在歐洲的記者生活的故事，因為這也許可以幫助讀者們看到那些正在背叛和平而把人類拖入一次新的世界戰爭的新災難中的人們的反民主政策的真相。

目 錄

前言

第一章	早期的日子	(一)
第二章	慕尼黑出賣	(七)
第三章	在被佔領的布拉格	(一七)
第四章	巴爾幹的秘密外交	(二五)
第五章	到蘇聯去	(三五)
第六章	當蘇聯作戰的時候	(四一)
第七章	人民樹立了他們的里程碑	(五九)
第八章	德國往何處去？	(六八)
第九章	在使館的窗後	(一三四)
第十章	爭取和平反對戰爭	(一五五)

第一章 早期的日子

表面上看來，我出生的蘭開夏沿海的市鎮，是一個近乎「桃花源」的地方，它是英格蘭北部陽光最好、最宜於衛生的市鎮之一。但是能够享受氣候益處的，只有那來自利物浦和孟徹斯特的富有商人、製造家和捐客們。

這些公民們有一種固執的信條——倒不是沒有充足理由的——認為他們一離開了堆棧或寫字間，就等於是別人可以靠他們的消費來獲利致富。

我的最早記憶之一，就是商人們早晨上班時候市鎮的情形。在七點到八點之間，街上擠滿着社會地位還很低的青年人、書記員和簿記員們，急急忙忙的趕到火車站，去佔坐在他們慣坐的火車座位上，一年到頭，一天又一天，直到社會的地位漸高，他們纔有了乘坐這一班車的特權。半小時之後，這纔接着來了他們的上司，緩步而行。這些中等階級柱石的尊貴，顯著地表現於他們的莊嚴而緊張的面容，而且事實上，他們總是獨自行走的。好像他們一離開了家，就已經被競逐金錢的忙亂吸住了。公司的董事們出來得更遲，平常總是坐了自備汽車到車站。他們處在社會階梯的頂點，市鎮上所有的人都羨慕他們，希望學他們的樣。

倘如看不看一下那整潔華麗的屋子的幕後，我們市鎮上能有許多人，看來也是「尊貴」的。英

國的中等階級懂得怎樣把家庭的秘密掩藏好，因此，我很久就不會懷疑到我們這小小世界中所表現的一切，原來並非如此。靜悄悄的街道，光滑地鋪着土瀝青，圍列着花園，門前釘着「乞丐小販不許入內」的亮晃晃的銅牌，那莊嚴整齊的一排排房子——它們不正是一個穩定社會的標徵：完全一片的「莊嚴和整齊」，不是恰跟窮人的「鄙陋和寒儉」相反麼？當然，我會被期望接受這樣的解釋，而當我在學校中獲得許多獎品時，一位牧師就向我保證，說我已經踏上了成功的階梯。必須了解，成功的意思就等於是一座朝南的獨立花園住宅，一個頭等火車的座位，以及當一年一度旅行者湧入時離開我們市鎮的辦法。

在這個草地密接而外表尊貴的世界中，我沒有朋友。我結交了一個朋友是偶然的，他在蘭開夏的漁夫公司做事。

向着淺海的防波堤，伸展在沙灘上足足有一哩長。當防波堤建成的時候，海水已在退落，剩下防波堤的鐵樁，裝飾着海藻和發亮的淡菜，只有一撮帶沙的水在海邊沖邊，僅能漂走一些棄物。一天，我從防波堤一根發鏽的柱爬下去，腳撲了空，我大聲呼救。

一個孩子向我跑來，幫我爬了下去。我們一同走着。我估計他的年齡約莫十五歲。當他抹去手上潮濕的沙土時，我注意到它們的粗糙，——像一個工人的手。他穿着一條褲腳捲起來的長褲子，和一件敞開的襯衫，背後有很大的裂縫。他赤着足。他平坦的臉孔上全是雀斑，扁鼻子。

「你上學嗎？」我問。

「現在沒有，」他回答說，我從他粗重的發音認定他是一個勞工階級的孩子。

「你住在那兒？」我問。

他說出了本寧西部（West Pennines），一個工業村鎮的名字。

「你父親做什麼的？」這是我們學校裏對一個新來孩子最初提出的問題之一，而回答，對於他以後所受的待遇是大有關係的。

「他做工的，」我的同伴很粗魯的回答說。

我感到不舒服。這不是一種平常的回答。

「你叫什麼名字？」他忽然問我。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叫做佛蘭克。你可搜集鳥兒的蛋麼？」

我們走到了我所熟悉的一塊泥沙乾燥的地方。這是泥沙藝術家的地方。自從我第一次由叔父帶領着到防波堤上來漫步以後，我就注意着這位泥沙藝術家，一個臉色異常蒼白的殘廢者，他的技術就是選擇一段幾碼轉方的堅固的泥沙，用各種木製的工具，把它雕出一種花邊似的圖案，代表着以壩坑作背景的巨型的工廠，冒煙的煙囪以及一系列一的工人住房。這圖案是精巧的，顯示着這位藝術家的刻意經營；勝過了任何的藝術天才，這種題材使那走過防波堤的工頭們感到興味，有的往往停下來，會擲幾文錢在那殘廢者寫着「工廠的犧牲者。搶施一個辨士吧」的地上。海水每天沖刷了這幅臨時的圖畫，而他總是每天重畫着。

佛蘭克和我走近了殘廢者，我的同伴就和他談起話來，這頗使我不安。原來這位藝術家曾是普拉茨（Platts）機器廠的冶鑄工人，因不慎墜鵠，成了殘廢，而佛蘭克現在正在普拉茨工廠當學徒。

當他留居我們鎮上的時期，佛蘭克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佩服他的勇敢，他輕視所有「上流社會的規矩，」——這在我是生來就被教遵守的，總之，他對一切事物熟悉，而且都能動手做。

這年秋天，我到奧得漢（Oldham）去和佛蘭克的父母相處了幾天。這位箍桶匠的茅舍，是許多毗連的茅舍的一排中之一，建造得密密層層。房主是一位孟徹斯脫銀行經理的寡婦，她顯然關照過建築者，要在那從當地主買來的幾畝澤地中，盡可能多的把茅舍塞進去。石砌的高牆圍繞着農場，恰和這村舍的邊緣相接。農場外面的澤地遠遠的伸展着，一眼望去，可以看到重山屏障的霧濛濛的山峯。

回想我和箍桶匠相處的日子，他們的正直使我感動，因為這種品格，是跟我從來所接觸的人們完全不同的。這家箍桶匠至少已有五代是勤勞的工人，他們的一位祖先，因他的一塊耕地被抄沒，使不得不到蘭開夏的紡織廠來找工作。

佛蘭克父親保藏了一本銅片精刻的書，記錄着蘭開夏織工常常歌唱的歌曲。這是一首配合織機的受受聲音的詩，這首詩貫穿了英國工廠生活的線索。

佛蘭克父親並未對我們宣揚革命。沒有一句話涉到我們市鎮上所默喻的政治。但我却遇到

了忠誠於他們自己階級的人，拿自己階級的文化來滋養的人，以他們的勝利爲光榮，在鬥爭的前面有決心。我瞭解了勞動者的神聖，也確信着他的權利。

自從和箍桶匠的家庭熟悉之後，我開始更密切地注意到我們市鎮生活的性格。我對它的卑鄙自私、它的事實和欺詐，越來越感到激怒了。

我的父母爲了肅清這種「危險」的思想，便把我送到一個寄宿的學校，在那裏，十分之九的學生都來自富家，其餘則是店主的兒子。

這個學校所授教育的主要特點，就是對於學生中間任何的創造和獨立的精神，都嚴厲的加以取締。一種令人苦惱的、愚蠢的不成文法給我們規定着，說道是我們在以後生活中應該尊重的習慣。例如上等的孩子們應該戴帽，而且只有戴在頭上，但當向一位先生行禮時，必須脫下來。

我們被教育着，獲取知識比之學習「社會風度」是次要的事。我們不但聽不到任何時事的新和一切最基本的政治科學的知識，就是連自然科學的法則，包括生物學在內，我們也是無知的，我們學校的課程，顯然是故意有計劃的掩蔽了一切帶有廣闊的人類覺悟的學問。學校從不讓我們看到歷史的變動潮流中的世界。我們一行一行的念着柯奈耶（Cornelle 1606—1684 法國戲劇詩人）的悲劇，我們讀莫賽（de Musset 1810—1857 法國詩人）和拉瑪丁（de Lamartine 1790—1868 法國詩人）浪漫派的詩，都德的散文，但對於巴爾札克、左拉和莫泊桑，却一個字也不讀。拜倫的著作我們是不翻的。迭更司和薩克萊的作品我們完全無知。

我之所以詳述我的童年和學校生活，因為這樣纔能說明中等階級教育對於形成每一個英國人遠景的巨大影響。就在這中等階級的學校裏，人們必須響應那些「保衛我們珍貴的一切」「基督教教價值」「歐洲的遺產」的號召，這是反動的政治家們用以保護他們自私自利的。這裏是歧視種族和蔑視勞工階級的溫床。每一片有關蘇聯的報道總是無恥地歪曲，以挑撥對蘇維埃國家的仇恨。

我的公立學校教育是在劍橋大學繼續的。我必須踏上廣闊的人生道路的一天終於來了。

我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已經爲着畢業後找尋工作而焦灼不安。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期，英國正處在經濟恐慌的掌握下，經濟的前途面臨着那想依照自己所學來找尋職業的青年。

經過幾年半失業和有時完全失業之後，我總算在蘭開夏一個大規模的紡織廠裏得到了工作。我工作的辦公室是一長列辦公室中的一個，這裏以前都是經營海外市場的。現在完全空着。單調、黯淡的氣氛籠罩着這座房子，令人想起了經濟生活已成廢墟的整個英國的境況。

當歐洲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日趨尖銳的那些日子，我應一家英國報紙的邀請到大陸上工作。我的記者生涯就這樣的開始了。

第二章 慕尼黑出賣

一九三四年五月，我初次以外國記者的身份訪問東歐諸國。

甚至像我這樣很少經驗的觀察者，也馬上看出了那些地方貧富生活尖銳的對照。

當我回顧戰前幾年訪問這些緊張紛爭的區域時，我的印象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對比的情景。想到布達佩斯格列脫(Gellert)浴室的窮奢極侈，便聯想到郊外衣衫襤褸的居民；想起蒂森(Tisza)山麓巨廈中祝壽的盛會，便聯想到沒有田地的農民們破陋的住宅。我記起以茲脫戈姆(Esztergom)教堂的華貴，高築在多瑙河上的匈牙利紅衣主教住宅，也記起我的居停叫做張伯倫主教的，因為掉下一把叉，而對他僕人臉上兇狠的一擊。我記起一個糧食豐足的匈牙利人，同時也記起一個飢餓的匈牙利人，記起一個把消費食物輸出到世界各地的捷克人，同時也記起有一百五十萬人的失業者。我記起一個豪華花園中美麗的家，住着塞爾維亞脫里卡(Treca)煤礦的英國經理；也記起橫陳的骸骨和那下班的受瘡痍疾侵襲的工人們發燒的面孔。我記起那窮愁的奢華和無度的荒淫，同時，也記起憤激不滿的潛伏的情緒，籠罩在烏葉柏士特(Ujpest)潘克拉區(Pankrac)和維納諾斯達脫(Nerstadt)等工人階級的區域。

這些東南歐國家的政權，都是由英法勢力扶植起來作為反布爾雪維克的堡壘的，它們始終嫉